

Shi

Jing

Yan

Jiu

Cong

Kan

诗经研究丛刊

第八辑

中国诗经学会◎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经研究丛刊(第八辑)/中国诗经学会编. - 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5

ISBN 7-80060-199-4

I. 诗… II. 中… III. 诗经-研究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3631 号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8

网 址: www.book001.com

电子信箱: 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

邮购电话: 010-67674055

销售电话: 010-67675512、67602949、67678944

印 刷 厂: 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印张: 850×1168 32 开本 12 印张

字 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1500 册

定 价: 30.00 元

《诗经研究丛刊》编辑委员会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主 编： 夏传才

编 委： 王长华 王洲明 向 熹

村山吉广(日本) 宋昌基(韩国)

陈新雄(中国台湾) 李家树(中国香港)

周颖南(新加坡) 林庆彰(中国台湾)

费振刚 赵沛霖 赵逵夫

聂石樵 顾易生 夏传才

董治安 褚斌杰

目 录

司马迁与《诗经》	张 强(1)
上博竹书《孔子诗论》与《诗三百》的经典化源流	刘冬颖(26)
《周颂·清庙》主旨考论	李瑾华(37)
《诗经·商颂》那、长发之位望	(日本)栗原圭介(53)
论吕祖谦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中的“诗史互释”	姚永辉(59)
陈继揆的《读风臆补》	宁 宇(75)
《诗经》中衣服的政治诠释与创意英译	(中国香港)洪 涛(85)
从《瞻卬》到《金瓶梅》 ——“女祸”论的演绎	张祝平(98)
· 比兴和文艺学研究 ·	
比兴寄托与清代词学	曹庆鸿(110)
《传》、《笺》、《疏》之“比”发展史考	(韩国)安性栽(130)
比兴研究回顾	袁长江(146)
以“风赋”、“比兴”、“雅颂”三纲目阐述《诗》六义之探究	(中国台湾)欧天发(154)
《诗经》与中国诗歌的自觉	陈一平(166)
《诗经》“女求士”诗的表现手法	叶志衡(179)

· 语言研究 ·

- 《诗经》中对近义单音词的文化阐释 华 锋(193)
- 《毛诗诂训传》解释通假说 赵伯义(209)
- 象声词的变异与发展
——以《诗经》、《元曲》为例 赵爱武(221)

· 三百篇研究 ·

- 郑卫婚恋诗和周代文化 刘五一(233)
- 试论《诗经》中的隐逸诗 孟庆茹(250)
- 从“行迈”的涵义看《黍离》的主题 李 蹊(269)
- 《大雅·生民》疑例析论 (中国台湾)何昆益(274)

· 现代诗经学人 ·

- 毛泽东和《诗经》 牟玉亭(299)
- 公木教授的诗经学研究 赵 雨(314)

· 学术札记 ·

- 毛公后裔毛三庄考察 田国福(333)
- 从《诗经》祭祀诗体会修身齐家之现实意义 王龙轩(338)
- 《诗经》爱情诗的类型 王许林(344)
- 关于《关雎》的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 张 剑(347)

振兴民族文化,再建《诗》学丰碑

- 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殷光熹(352)
- 中国诗经学会工作报告
——摘自夏传才在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
..... (360)
- 中国诗经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纪要 (368)

司马迁与《诗经》

张 强

摘 要: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经学兴起的年代,在这一背景下,《诗》所倡导的行为准则势必要成为司马迁手中的价值评判尺度。从大的方面讲,司马迁治《诗》有两个来源,一是上承孔子;一是近袭汉代《诗》学。所谓上承孔子,是指司马迁治《诗》以孔子论《诗》为最高思想原则,以礼乐推明王道;所谓近袭汉代《诗》学,是指司马迁习《诗》与汉代四家诗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这两个方面混融在一起,遂构成了司马迁与《诗》的关系,进而是《史记》与《诗》的关系。

关键词:孔子 鲁诗 荀子 引称义例

一、司马迁与孔子论《诗》

司马迁治《诗》上承孔子。近年来,战国楚竹书《孔子诗论》^[1]的出土,使我们对孔子论《诗》的面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结合《孔子诗论》及《论语》等文献,孔子论《诗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:一是从宏观的角度论述《诗》的文化品质。孔子云:“诗无泯志,乐无泯情,文无泯意。”(《孔子诗论》,以下引用

《孔子诗论》，凡不注明者，皆出自廖名春《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》）何为“诗无泯志”？廖名春先生指出：“‘诗无泯志’即‘诗言志’之否定之否定。”^{〔2〕}这一结论大体上道出了实情。孔子又云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又云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这些论述包含了孔子对《诗》的深刻理解和认识。二是从《诗》的分类入手进行中观研究。孔子云：“《颂》，旁德也，多言厚，其乐安而迟，其歌伸而引，其思深而远，至矣。《大雅》，盛德也，多言（……《小雅》）□（德）也，多言难而怨湛者也，衰也，小矣。《邦风》其纳物也博，观人俗焉，大敛材焉，其言文，其声善。”（《孔子诗论》）按，《邦风》系《国风》的别称，古代“邦”与“国”同义。孔子又云：“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！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这些研究对宏观研究作出必要的补充，是孔子论《诗》的重要方面。三是针对《诗》的具体篇章提出个人的见解，带有微观的性质。如孔子云：“《雨无政》、《节南山》皆言上之衰也，王公耻之。《小旻》多疑，疑言不忠志者也。《小宛》其言不恶，小有仁焉。《小弁》、《巧言》，则言谗人之害也。”（《孔子诗论》）又云：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这些研究作为宏观、中观研究的补充，使孔子论《诗》更具有现实针对性。

孔子论《诗》的思想直接影响到司马迁治《诗》的思想。孔子云：“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司马迁亦云：“《易》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，故长于变；《礼》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；《诗》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

雌雄，故长于风；《乐》乐所以立，故长于和；《春秋》辩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何为“风”？《毛诗序》云：“风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……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”“风”与“变”、“行”、“政”、“和”、“治人”处于同一层面，其语旨在强调《诗》对社会的认识作用。孔子又云：“（《甘棠》之报，敬）召公也。……吾以《甘棠》得宗庙之敬，民性固然。”（《孔子诗论》）司马迁亦云：“召公之治西方，甚得兆民和。召公巡行乡邑，有棠树，决狱政事其下，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，无失职者。召公卒，而民人思召公之政，怀棠树不敢伐，哥（歌）咏之，作《甘棠》之诗。”（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）这些论述主要涉及到《诗》与政治、《诗》与教化及其他方面的内容，如果加以对比，可知司马迁治《诗》的路径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指出：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，始于衽席，故曰：‘《关雎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，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，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。’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，礼乐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备王道，成六艺。”这里涉及到三个问题，一是孔子删《诗》，使《诗》成为三百零五篇的规模；二是《诗》有“四始”之说；三是孔子“弦歌之”，使《诗》与礼乐紧密结合，进而成为“备王道”的载体。

孔子删《诗》的记载初见于《史记》，这一观点直到唐代才有

人提出质疑。唐代孔颖达给《毛诗》作《疏》时指出:“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:古者《诗》本三千余篇,去其重,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。是《诗》三百者,孔子定之。如《史记》之言,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。案《书传》所引之诗,见在者多,亡逸者少。则孔子所录,不容十分去九。司马迁言古者三千余篇,未可信也。”清人赵翼亦指出:“古诗本无三千,今以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二书所引之诗校之。……则所引逸诗多于删存诗之十倍,岂有古诗则十倍于删存诗,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?以此而推,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。”^[3]“《诗》三百”一词首见于《论语》,《论语》成书于战国时期,战国时期以“《诗》三百”论《诗》者远远不止孔子一人。如《墨子·公孟》有“诵诗三百,弦诗三百,歌诗三百,舞诗三百”一语。综合这些情况,似乎司马迁提出的孔子删《诗》说难以成立。然而,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史学家,其说必有所本。那么,应如何认识孔子删《诗》说呢?

汉代传《诗》者一向重视师法。清人皮锡瑞指出:“汉人最重师法,师之所传,弟之所受一字母敢出入,背师说即不用。”^[4]司马迁师承《鲁诗》,以此推论,司马迁的孔子删《诗》说有可能源于《鲁诗》。一般认为,《诗序》本于子夏,很有意味的是,“《孔子诗论》所阐发的诗论观点,与《诗序》极为一致”^[5]。子夏是孔子的弟子,据此,《孔子诗论》产生的年代早于《论语》当没有问题。因为《论语》除了记载孔子与门人的谈话外,还记载了孔子再传弟子的言论。《孔子诗论》涉及到的诗篇有五十九篇,其中有七篇佚诗。《论语》论《诗》有十八条,涉及到的佚诗仅有一条。因《孔子诗论》产生的年代早于《论语》,《论语》写

定的下限可能在战国中后期,以此补充中间的链条,孔子删《诗》的提法可能与《鲁诗》的传授相关。

这里只提《鲁诗》,不提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,是因为齐、韩两家“多本于申公”(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)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:“汉兴,鲁申公为《诗》训诂,而齐轅固生、燕韩生皆为之传。或取《春秋》,采杂说,咸非其本义。与不得已,鲁最为近之。”《毛诗》晚出,“自谓子夏所传,而河间献王好之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。从其内容看,《毛诗》没有孔子删《诗》之说。《隋书·经籍志一》云:“《齐诗》,魏代已亡;《鲁诗》亡于西晋;《韩诗》虽存,无传之者。唯《毛诗郑笺》,至今独立。”作为反证,唐以前的治《诗》者没有对孔子删《诗》说提出质疑,可能与传《诗》者特别是《鲁诗》有明确的说法相关。因为“汉人最重师法”,否则早就应该提出质疑。当然,这是推测,有待于进一步证明。换言之,孔子删《诗》的说法可能来源于汉代《诗》学,进而是《鲁诗》,不是司马迁个人独立得出的结论。

仔细分析司马迁叙述孔子删《诗》时的这段话语,应该说,司马迁的主旨并不是强调孔子删《诗》一事,而是企图借助于删《诗》一事突出孔子治《诗》“取可施于礼义”和“以备王道”的思想。司马迁认为,“以备王道”是孔子治《诗》的终极目标,那么,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终极目标呢?司马迁将《诗》的文化品质定位于“礼义”方面。问题是,《诗》如何才能承担起“施于礼义”的责任呢?司马迁以孔子论《诗》的思想为准绳,重点突出了“四始”在《诗》中的中心地位。

“四始”的说法起源于何处?对此,古人有不同的看法。如

魏源指出:“《周礼》:太师以六诗教国子,一曰风,二曰赋,三曰比,四曰兴,五曰雅,六曰颂,而六义兴焉。故季札观乐,已分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名,其体宏用博矣,而汉儒以‘四始’之说媿之。《鲁诗》一说,《韩诗》一说,《毛诗》一说,《齐诗》一说,后人无一能析之者。先以《鲁诗》之义明之。司马迁曰:‘《关雎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,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,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,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。’乌乎!何书不有发端?体例奚关大义?盖尝深求其故。而知皆三篇连奏,皆上下通用之诗,皆周公述文王之德,皆夫子所特定。义至深,道至大也。”^[6]这段话有四个要点,一是“四始”源于《周礼》中的“六诗”;二是“季札观乐”之前已出现了“四始”的雏形,汉儒所说的“四始”与“季札观乐”有直接的联系;三是司马迁的“四始”说来源于《鲁诗》;四是“四始”的音乐特征是“三篇连奏”,为孔子“所特定”。魏源的观点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司马迁与孔子论《诗》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。客观地讲,这四个要点有合理的地方,也有不妥之处。

首先,魏源将“四始”的雏形上溯到《周礼》“六诗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“六诗”涉及到两个问题,一是《诗》的艺术表现手法;二是《诗》的编排方式。相比较而言,后一个问题与“四始”有直接的联系。在传播和传授的过程中,《诗》形成了按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编排的结构,这一编排结构直接影响到“四始”之说的形成。

其二,“六诗”以后,季札以《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颂》论《诗》,为“四始”说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云:

请观于周乐。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。曰：“美哉！始基之矣，犹未也，然勤而不怨矣。”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。曰：“美哉渊乎！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《卫风》乎！”为之歌《王》。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惧，其周之东乎！”为之歌《郑》。曰：“美哉！其细已甚，民弗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？”为之歌《齐》。曰：“美哉！泱泱乎，大风也哉！表东海者，其大公乎！国未可量也。”为之歌《豳》。曰：“美哉，荡乎！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？”为之歌《秦》。曰：“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？”为之歌《魏》。曰：“美哉，沍沍乎！大而婉，险而易行，以德辅此，则明主也。”为之歌《唐》。曰：“思深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！不然，何其忧之远也？非令德之后，谁能若是？”为之歌《陈》。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！”自《邶》以下，无讥焉。为之歌《小雅》。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！犹有先王之遗民焉。”为之歌《大雅》。曰：“广哉，熙熙乎！曲而有直体，其文王之德乎！”为之歌《颂》。曰：“至矣哉！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屈，迥而不逼，远而不携，迁而不淫，复而不厌，哀而不愁，乐而不荒，用而不匮，广而不宣，施而不费，取而不贪，处而不底，行而不流。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。”

季札观乐时，虽没明确地提出“四始”，但从音乐的角度阐

释《诗》的内涵,并把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视为“始基”,实际上已经为“四始”的提出埋下了伏笔。季札观乐发生于公元前544年,这时,孔子才七岁。可见“四始”说萌芽于孔子以前。因此,魏源认为《史记》中的“四始”源于《鲁诗》是不妥的。

其三,魏源之前,虽然有陈乔枏、王先谦、唐晏等提出司马迁习《诗》为《鲁诗》的观点^[7],然而,将司马迁治《诗》完全纳入到《鲁诗》的轨道却有以偏概全之嫌。因为司马迁论《诗》除了采用《鲁诗》说之外,还引用了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的观点。换言之,认定司马迁的“四始”源于《鲁诗》,是没有说服力的。那么,司马迁所说“四始”是否来源于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以及《毛诗》?《齐诗》和《韩诗》“多本于申公”,从这一角度看,认为《史记》中的“四始”源于《齐诗》和《韩诗》也是不妥的。《毛诗序》中有一段文字值得我们重视:“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,风之始也,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,故用之乡人焉,用之邦国焉。……是以一国之事,系一人之本,谓之风。言天下之事,形四方之风,谓之雅。雅者,正也,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,故有小雅焉,有大雅焉。颂者,美盛德之形容,以其成功,告于神明者也。是谓四始,《诗》之至也。”那么,是否可以说《史记》中的“四始”源于《毛诗》呢?从《史记》中可以得知,司马迁主要与鲁、齐、韩三家诗发生关系,与《毛诗》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如解释“四始”时,司马迁特别注意“《关雎》之乱”的内涵。何为“《关雎》之乱”?魏源指出:“古诗章皆一诗为一终,而奏必三终,从无专篇独用之例。故《仪礼》歌《关雎》则必连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而歌之;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歌《鹿鸣》之三,则固兼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而举之;歌《文

王》之三，则固兼《大明》、《绵》而举之；《礼记》言升歌《清庙》，必言下管象舞，则连《维天之命》、《维清》而举之。他若金奏《肆夏》之三，工歌《蓼萧》之三，《鹊巢》之三，笙奏《南陔》之三、《由庚》之三，此乐章之通例。而四始则又夫子反鲁，正乐正雅颂，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，冠于四部之首。固全诗之裘领，礼乐之纲纪焉。故史迁不但言《关雎》为风始，而必曰‘《关雎》之乱’者，正以乡乐之乱，必合乐《关雎》之三。故特取夫子师挚之言以明三终之义。”^[8]很显然，司马迁所说的“四始”与《毛诗》所说的“四始”的所指不同。按照魏源的观点，司马迁的“四始”主要强调了“古诗章皆一诗为一终，而奏必三终，从无专篇独用之例”。相比之下，《毛诗》主要是从单篇入手。

其四，司马迁记载“四始”时使用了“故曰”二字，这表明他所说的“四始”是有所本的。那么，司马迁所说的“四始”源于何处呢？《孔子诗论》云：

曰：“诗其犹广闻欤？善民而裕之，其用心也，将何如？”曰：“《国风》是也。”“民之有憾患也，上下之不和者，其用心也，将何如？”

（曰：“《小雅》是也。”“……者将何如？”曰：“《大雅》）是也。”“侑成功者何如？”曰：“《颂》是也。《清庙》，王德也，至矣。敬宗庙之礼，以为其本。‘秉文之德’，以为其业。‘肃雍（显相）’……行此者其有不王乎？”

按，以上所引以廖名春先生《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》为

基本依据,在结合李学勤先生《〈诗论〉简的编联与复原》的意见的基础上^[9],与马承源先生主编的《战国楚竹书(一)·孔子诗论》对照后综合而成的^[10]。文中所引“‘肃雍(显相)’……行此者其有王乎?”一语系采纳李学勤先生的意见,此语以前的文字采纳廖名春先生的意见。又按,缺字能补出的用“()”号表示;不能补出而可数的用“□”表示。简中脱文以及脱简缺文的地方也用“()”表示。客观地讲,廖名春先生根据脱简和缺简的情况补出“《小雅》是也”数语,是符合《孔子诗论》行文上的逻辑的。李学勤先生指出:“《诗论》全篇始于论国风,其次风与小雅,继之大雅与颂,以通说《诗》旨终结,确是有比较严密组织的著作。”^[11]从这一意义上讲,我们综合诸先生的意见对所引文字作必要的调整可能更接近《孔子诗论》的本来面目。

这段文字谈论的对象主要是《诗》的“四始”问题。文字从谈论《邦风》开始,随后论及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,最后论及《颂》,并将其落实到《清庙》方面。以此与“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”一语相对照,可以看到,司马迁所说的“四始”与《孔子诗论》的思想逻辑有很大的相似点。特别是司马迁提出“四始”后,又专门强调了孔子与“四始”的关系,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。礼乐自此可得而述,以备王道,成六艺。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以此与《孔子诗论》中的“行此者其有不王乎”一语相对照,司马迁所说的“四始”应该与《孔子诗论》有直接的联系。

还应该看到的是,司马迁记载“四始”时特地强调了“《关雎》之乱”。孔子说:“师挚之始。《关雎》之乱,洋洋乎盈耳

哉!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两厢对比,司马迁从音乐的角度阐释《关雎》在《诗》中的地位和作用,与孔子的认识是相通的。那么,孔子赋予《关雎》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?对此,匡衡有精辟的论述,“孔子论《诗》以《关雎》为始。言太上者民之父母,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,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,故《诗》曰:‘窈窕淑女,君子好仇。’言能致其贞淑,不贰其操,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,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,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。此纲纪之首,王教之端也。自上世以来,三代兴废,未有不由此者也。”(《汉书·匡衡传》)换言之,司马迁论《诗》主要遵循了孔子论《诗》的思想路线。综合这些情况,司马迁记载的“四始”上承孔子论《诗》的思想是没有问题的。

二、司马迁与《鲁诗》及荀子之关系

在研究汉代《诗》学的过程中,清人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成就:一是通过梳理文献,辑录了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和《韩诗》等三家遗说;二是通过考辨,澄清了汉代习《诗》者的师承关系。与鲁、齐、韩、毛四家诗相比,司马迁治《诗》虽然没有创立自己的学派,但《史记》论《诗》的地方却有七十多处,这种情况表明,司马迁治《诗》是汉代《诗》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清人认为,司马迁习《诗》传自《鲁诗》。如陈乔枬指出:“《史记·叙传》自言讲业齐鲁之都,子长宜习《鲁诗》。又,《儒林传》言韩婴为《诗》与齐鲁间殊,似不深信韩氏,且子长时《诗》惟鲁立博士,故《史记》所引《诗》皆鲁说也。乔枬谨案,全氏祖

望云:太史公尝从孔安国部古文《尚书》,安国为《鲁诗》者也。史迁所传当是《鲁诗》。乔枏今即以《史记》证之。其传《儒林》首列申公,叙申公弟子首数孔安国。此太史公尊其师传,故特先之据是。以断《史记》所载《诗》必为鲁诗无疑矣。”^[12]王先谦的观点似乎更为全面,“《鲁诗》授受源流,《汉书》可考。申公受《诗》于浮邱伯,伯乃为荀卿门人也。刘向校录孙卿书亦云:浮邱伯受业于孙卿,为名儒。是申公之学出自荀子。《荀子》书中说《诗》者大都为鲁说所本。今缀之列于《鲁诗》原其所自始也。孔安国从申公受《诗》为博士,至临淮太守。见《史记·儒林传》和《汉书·儒林传》的基础上提出的。如在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中,司马迁记载了一代大儒孔安国从申公受《诗》的情况。稍后,班固在《汉书·儒林传》中指出:“孔氏有古文《尚书》,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,因以起其家逸《书》,得十余篇,盖《尚书》兹多于是矣。遭巫蛊,未立于学官。安国为谏大夫,授都尉朝,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。迁书载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、《微子》、《金縢》诸篇,多古文说。”因司马迁曾经从孔安国受《诗》,这样,司马迁以《诗》为史、以《诗》证史、以《诗》论政势必要遵循《鲁诗》的思想路线。为此,陈桐生先生指出:“汉文帝即位之初,重用《鲁诗》学者赵绾、王臧以实施改制,并安车驷马礼聘《鲁诗》大师申公出山,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:在春秋公羊学未尊之前,五经之中实以《鲁诗》的学术地位最高。”^[14]这一观点大体上道出了司马迁习《鲁诗》的原因。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云:“文帝时,闻申公为《诗》最精,以为博士。”《后汉书·翟酺传》又云:“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。”由此观之,申公是最早的一经博士,